



写在政治的边上

Xiezai Zhengzhi de Bianshang

黄 钟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D609.9

51

D609.9

22

写在政治的边上

Xiaoxiai Zhengzhi de Bianshang

黄 钟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写在政治的边上 / 黄钟著. — 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9

(国是文丛)

ISBN 7 - 301 - 09459 - 0

I. 写… II. 黄… III. 国际政治 - 文集
IV. D5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87260 号

书 名：写在政治的边上

著作责任者：黄 钟 著

责任编辑：刘金海

标 准 书 号：ISBN 7 - 301 - 09459 - 0/C · 0364

出 版 发 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cbs.pku.edu.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121

电 子 信 箱：ss@pup.pku.edu.cn

排 版 者：北京高新特打字服务社 82350640

印 刷 者：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850mm × 1168mm 32 开本 8.5 印张 170 千字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6.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写在前面

主持《国是文丛》，对于我来说是一件“轻省的重负”。经过各方的努力，第一辑十册“呕心”之作呈现在读者面前，我们心存惶恐。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所谓“国是”历来是掌权者把持的“千准万确”之最高国策，容不得“异论”相侵扰。《说文解字》中关于“是”的“直也从日正”之解释，并没有给出“日正”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之来源。但毕竟时代不同了，在当今社会，“国是”再也不能是统治者们关起门来的一己之私事，而是公共之事，是全民参与的民主议事。记得我在《大国》第三期的“编者手记”中这样写道：近些年来，随着中国公共意识的发育成熟，人们的思想已经日渐摆脱陈旧的意识形态的束缚，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建设等问题，我们开始能够从一个政治体的本性出发考察它的利益得失、兴衰机制和战略构架。

基于上述考量，《国是文丛》旨在展示目前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优秀青年学者对于国家事务和公共事务的认识、意见、观点和看法，通过他们的文粹，使广大读者对于社会与国家以及个人权利、责任等方面的知识有所提高，眼界有所洞开，思想有所深化，观点有所匡正。就内容来看，《国是文丛》力求涉及政治、法律、经济、社会、外交等中国社会的诸多方面，基本上以《大国》丛刊的视野为轴心，即内政外交的宏大叙事的思路框架。但与《大国》不同的是，《国是文丛》不属于学

院式的研究论文或者课题项目，而是个人性的随笔、散论、评说或札记，聚焦热点问题，阐发一己独见，尖锐坦直，意气风发，富有洞察力和内蕴的激情。

政治系一门专门的技艺，民主政治和公共舆论并不诉求绝对的观点正确，它呼唤的是宽容和良知。英国思想家阿克顿曾经指出：“良知越是更积极地走上社会生活的前沿，那么，我们考虑得更多的就不是国家已做了什么，而是国家允许人们能做什么；那么，我们考虑得更多的就不是国家的行为——它的行为的力量以及对这种力量的运用，而是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及其对权力的分权设立。社会要优先于国家，个体心灵要优先于国家权力。”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块垒，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问题。生活在当今这样一个巨变的时代，与其说是一种悲哀，不如说是一件幸事，至少我们经历、见证乃至参与了这个时代变迁的火焰与灰烬。但愿我们的《国是文丛》伴随着祖国一道成长，为培育公共的现代国民意识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高全喜

2005年5月20日

于北京西山古月园

序 书生意气见真情

刚认识黄钟时还以为他是经济学家——因为我们经常一起吃饭的都是以经济学为专业的。读了他的文集《游手好闲地思想》才知道他涉猎的面极广。这本《写在政治的边上》同样是这样的特点。他曾经担任《战略与管理》杂志的常务主编，这是一本我过去常看的刊物。它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法律、历史等广泛的社会科学领域。以经济为专业者，岂能主持这种杂志？我不该有此错觉。

黄钟属于出生于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的新一代学者。与我们这些出生于 40 年代的人相比，有了更多的选择，更好的读书机会和更敏锐的思想。他们之中有更多的人选择出国、从政或从商。这些都是新时代的时尚。选择以学术为业者并不多，但却出了黄钟、赵晓、钟伟、巴曙松、余杰等一批优秀的学者。我们上大学时读的书相当有限，不少书在禁止之列，即使让读也要带着批判的眼光，知识面极为有限。他们这一代上大学时已是开放年代，各种新思潮应接不暇，他们可以自由地读、自由地想，思想当然要开阔得多，知识面也广得多。多年的阶级斗争使我们这一代人圆滑了、世故了。也许与朋友在一起聊聊会闪出一些新思想，但写成文字又自觉不自觉地八股了。也许会有人说他们幼稚、偏激，但这与圆滑、世故相比，幼稚、偏激是优点。也许他们的一些思想、观点不成熟，但思想的突破正在于这种不成熟。哪一种新思想开始时是成熟的？成熟

的东西总是老气横秋的，思想尤其如此。

与出生于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的许多新锐学者一样，黄钟的文章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涉及面广。读这本《写在政治的边上》，内容从财政、经济增长，俄罗斯、朝鲜、日本、新加坡等国际问题，到中国的黑社会、矿难、反腐、农民等问题，无所不包。其分析方法也如同缪尔达尔主张的一样，是跨学科的，实证分析、规范分析，穿插于各篇文章之中。二是思想敏锐，观点鲜明，有许多给人以灵感和思考。比如，对于经济增长还是莺歌燕舞者多，对高增长的喜悦大于忧虑，但黄钟在《警惕增长的极限》中却对此发出警告，提醒我们要注意高增长下的高风险。对于俄罗斯，国人还是贬大于褒，但黄钟看到俄罗斯转型的成功之处，这就是《俄罗斯挑战中国模式》一文的意义。我在读这本书稿时，深为他的许多鲜明观点所触动。也许他的观点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的思考对我们进一步思考是有意义的。一个观点不在于其本身正确与否，而在于能否给人以启示。我不敢说黄钟的每一个观点都正确，每一篇文章都精彩，但我敢说，他的每一个观点、每一篇文章都有启发意义。

黄钟他们这一代人并不总是把爱国主义之类的桂冠戴在自己头上，但他们的研究与探索充满了对祖国、对未来的期望。改革和现代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也是每一个人——不同年代的人共同关心的话题。黄钟所有的文章都围绕着这一主题，无论是关于国内问题的，还是国际问题的，无论是小事，还是大事。黄钟是一个年轻的书生，但他思考大事，以他微薄之力推动着时代前进，这正是他们这一代人的爱国真情。

当我与同时代人共处时，感到自己的心是年轻的，但我与他们这些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的人共处时，我感到自己老了，缺乏了他们那股可贵的锐气，少了几分天真。所以，我爱读他们的文章，希望更新思想，赶上时代。人老不要紧，思想老才是可怕的。也正出于这种想法，当黄钟请我给他的新作《写在政治的边上》写序言，就不自量力地答应了。读过他的全部书稿就写下了这篇杂感充当序言。

梁小民

2005 年 4 月 18 日 怀柔陋室

目 录

序 书生意气见真情	梁小民(1)
第一编 经济问题评论	(1)
警惕增长的极限	(3)
和平转型重于和平崛起	(14)
俄罗斯挑战中国模式	(22)
警惕黑社会资本主义	(31)
中国财政预算制度的反思	(39)
中国的矿难经济	(47)
第二编 转型问题评论	(55)
应冷静对待社会冲突	(57)
和平转型的基本条件	(63)
化解“民怨”的渠道	(72)
从高官调整看官制弊端	(79)
信访制度应该废除	(89)
“问责”的背后	(99)
一个农民等于几分之几个市民	(106)
第三编 国际问题评论	(121)
当心新加坡	(123)
崛起是如何变成坏事的	
——纳粹覆亡六十年祭	(131)

第四编 历史问题评论	(143)
超越告别革命或造反有理	(145)
质疑中华大祭祖	(158)
需要全面书写抗战史	(165)
第五编 移民问题评论	(173)
谁在砸我们的饭碗	(175)
正视中国的贫民窟	(206)
在自己的祖国,为什么只能暂住	(214)
移民的孩子,谁的花朵	(234)
后记	(258)

第一编 经济问题评论

虽然不必夸张地认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但也不应否认，资本和权力一样，都有沾上血和肮脏东西的倾向。一旦资本和权力不受制约地结合起来就必然导致血淋淋的残酷和肮脏。

警惕增长的极限

四十八年前，毛泽东在一次演讲里提到了著名的“球籍”问题：“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优胜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96页）

球籍问题迄今倒是没有出现，可我们赖以立足的家园，却空气日益龌龊、土地越发贫瘠、河流走向干涸……虽然中国几十年如一日地埋头赶超和对赶超进行乐观豪迈地注释，从来没有像罗马俱乐部发表《增长的极限》那样，也发表“中国困境的报告”，但困境早已经摆在了面前。

尽管我真诚地希望，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三十年后回首往事时，我今天的说法或者担心，不过是杞人忧天。但是古人说得好：“明者防患于未萌，智者图患于将来。”在不断看到2020年GDP在2000年的基础上再翻两番，甚至2050年中国前景将如何灿烂的时候，在由衷高兴的同时，我也止不住地想到了“极限”这个词。中国是否存在增长的极限呢？

中国经济增长面临极限挑战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无论是赶超理想还是崛起的目标,只包含有经济发展这一项,就离不开资源消耗。既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没有这样便宜的事。经济增长不是浪漫曲。

资源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软肋和瓶颈。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意味着我们承认,老路快要走不下去了,经济增长面临极限。

中国地大,可相对未来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来说,却并不物博。据中国地质科学院的一项研究报告,未来二三十年内中国现有资源的供应将不可持续。今后二十年,中国实现工业化,石油、天然气、铜、铝矿产资源累计需求总量则至少是目前储量的2—5倍。据统计,中国现有煤炭的探明储量为818亿吨,石油为25亿吨,天然气为5.4亿吨。以2000年为起始点,到2020年,中国年需煤炭16亿—18亿吨,20年累计需247亿—268亿吨;石油年需5.5亿—6.4亿吨,10年累计需85亿—92亿吨;天然气年需0.6亿—0.7亿吨,10年累计需9.2亿—10亿吨。中国油气资源的现有储量将不足十年消费,最终可采储量勉强可维持30年消费;到2020年,中国石油的进口量将超过5亿吨,天然气将超过1000亿立方米,对外依存度将分别达70%和50%。未来二十年中国石油需求缺口超过60亿吨,天然气超过2万亿立方米。(张静,《中国资源危机报告:走出去的机会》,载于《21世纪经济报道》,2003年1月6日)

不仅是能源问题如此。在铁、铜、铝等重要矿产资源上,中国同样面临一个用什么来持续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的问题。中国地质科学院的研究认为,2012—

2014 年,中国将迎来年 2.4 亿—2.6 亿吨铁的消费高峰,未来二十年缺口将达 30 亿吨;2019—2023 年,将迎来年 530 万—680 万吨铜的消费高峰,未来 20 年缺口将达 5000 万—6000 万吨;2022—2028 年,将迎来年 1300 万吨铝的消费峰值,未来 20 年缺口将达 1 亿吨。

(张静,《中国资源危机报告:走出去的机会》,载于《21 世纪经济报道》,2003 年 1 月 6 日)

2002 年 11 月,中国地质科学院在一份题为《未来二十年中国矿产资源的需求与安全供应问题》的报告中提出,今后二十年,中国实现工业化,石油、天然气、铜、铝矿产资源累计需求总量至少是目前储量的 2—5 倍。(于莘明、曹菲,《科研报告警告:中国未来 20 年将面临矿产资源短缺》,中新网 2002 年 12 月 30 日电)未来二三十年内中国现有资源的供应将不可持续。

当然,这样的研究并不等于就是标准答案。尽管不同的研究会有不同的结果,但是中国自身的资源满足不了持续发展的需要却已经成为事实。

官方数据显示,五十多年来,我国的 GDP 增长了大约 10 倍,而矿产资源消耗却增长了 40 倍。2003 年,我国已成为煤炭、钢铁、铜的世界第一消费大国,世界第二石油和电力消费大国。原油、原煤、铁矿石、钢材、氧化铝和水泥的消耗量,分别约为世界消耗量的 7.4%、31%、30%、27%、25% 和 40%,而创造的 GDP 仅相当于世界总量的 4%。照这种高消耗低产出的方式,如果中国经济总量再翻几番,哪里去弄那么多资源可供消耗?

无论何种估计,经济快速增长与矿产资源大量消耗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已经不是预测,而是现实了。

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分享世界资源的竞争将日趋激烈,而世界的资源本身也是有限的。以铜为例,目前世界探明的铜资源储量是6.5亿吨,经济可利用的储量是3.4亿吨。假设中国未来二十年铜的缺口达5000万—6000万吨,要知道,中国人口只占世界的五分之一,如果世界其他人口也按照中国人均标准消费,那将意味着二十年后全世界经济可利用的铜资源储量全部开采了也不够用。

严重的资源瓶颈使中国经济增长面临极限。我们曾经一再批评美国消耗了世界的很多资源,如今,中国自身已经面临同样的问题。未来几十年,只要中国工业化进程没有停止或者中断,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矿产资源消费大国,乃是大势所趋。无论是善意还是恶意,“谁来供给中国资源”都将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地成为一个真正的问题。中国应该正视矿产资源危机的问题,在这个基础上跟世界其他国家合作对话,而不是为了维持经济增长,向世界证明中国根本就不存在资源危机,对国内的矿产资源竭泽而渔。在这个意义来说,谈论中国经济增长的极限不是绝望,不是恐惧,而是正视现实的危机,以及危机所带来的挑战,希望国人能够居安思危,不至于将来抱佛脚。

经济增长还是硬道理吗

我们已经习惯于勾画宏伟、美好的未来蓝图。口号常常以“硬道理”、“中心”、“压倒一切”之类坚定得有些武断的句式表达。畅想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更受上上下下的欢迎。“子规半夜犹啼血”,那是惊了安乐梦。比如,在人民公社的狂潮里,共产主义的天

堂似乎触手可及。在风口浪尖上,说出不同意见就是犯忌,人们在宏伟蓝图面前最安全的选择就是恭维和敬畏。当某个蓝图在现实面前破产之后,就又向前看,对下一个蓝图进行恭维和敬畏。中国缺乏对权力“说不”的环境和习惯。

在这样的环境中,中国就非常容易表现出格外的乐观。经济学家提出诸如小康之家就是要有两套住房、2020年再翻两番之类美好构想的时候,似乎并没有觉得如此小康、翻番到底需要多少钢材,石油、钢材等等可能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问题。可偏偏这是问题的要害。没有钢材,大楼是建不起来的;没有石油,汽车可能就成了一堆废料。中国关注增长却常常忽视或者无视增长的基础和代价。

五十多年来,无论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公布的经济增长速度总是令人刮目相看。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背后,到底付出了多大资源与环境代价,似乎不值得在政府工作报告里一提:我国现有荒漠化土地面积267.4万多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27.9%,而且每年仍在增加1万多平方公里;我国18个省的471个县,近四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正受到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威胁;到20世纪末,全国668座城市中,已有四百多个城市供水不足,其中比较严重的缺水的城市达110个,全国城市年缺水60亿立方米。全国131个流经城市的河流有70%被污染;酸雨面积已占国土面积的30%……大自然在报复我们。倘若有一天,我们突然发现,四亿人彻底丧失了家园,这还仅仅是一个环境问题吗?还有多高的经济增长会比这个问题更具有爆炸性呢?再比如,中国由于水资源的